

陈国凯自选集
长篇小说卷

我呼天天不语，喊地地无声

求他别这样做，这样做会毁灭他自己的

可是我连死的幸运都没有

代价

花城出版社

陈国凯自选集

· 长篇小说卷 ·

代 价

花 城 出 版 社

陈国凯自选集
长篇小说卷(一)

代 价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125印张 / 3 插页 19万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360—0801—5/I·719

定价: 3.80元

出版前言

陈国凯，1938年出生，广东五华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作家协会文学学院院长。

陈国凯于195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笔耕30多年，创作了《部长下棋》、《我应该怎么办》、《文坛志异》、《代价》、《荒唐世事》、《好人阿通》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代》文学奖和广东鲁迅文学奖。有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德等国文字，在国外刊载和出版。

最近，陈国凯从他100多万字的作品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力作，编入《陈国凯自选集》，由我社分卷出版。第一批出版的有：短篇小说卷《我应该怎么办》、中篇小说卷《都市姑娘》和长篇小说卷《代价》。

《陈国凯自选集》是陈国凯创作成果的展示和艺术风格的体现，反映了陈国凯3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在编集时，陈国凯除对自己的作品作了认真的筛选外，还对入集的作品作了进一步的润色，使作品更精粹，更具可读性，更加耐人寻味。

花城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九月

第一章

1978年5月的一天，一场“白撞雨”过后，乌云消散了，天放晴了。威力无比的太阳恢复了它的光辉，把天地间照耀得辉煌灿烂。天空洁净得象块蔚蓝色的玻璃。被雨水洗涤过的空间和大地，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山更青了，树更绿了，带雨的花儿也分外鲜艳了。连空气也是清甜清甜的。

南方冶炼厂的职工子弟小学，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这是一座环境十分幽雅的小学校，座落在S市东郊工人新村的东边。一道米黄色的砌花围墙里面，有鲜花盛开的花圃，绿草如茵的小足球场，喷珠吐玉般的喷水池，修整得很好看的树木。在这诗一般的环境里，矗立着几幢粉刷得雪白雪白的四层楼的漂亮校舍，琅琅的读书声从各个课室里飞出来，象动人的童声大合唱，音符满天。一张张活泼的儿童的笑脸，象春天里娇艳的鲜花在开放。

上午11点多钟，放学铃声响了。一群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象冲出闸网的鱼群，欢蹦乱跳地从各个课室涌出校门，向工人新村四散走去。

这时，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李文玉正在擦黑板，一个怯生生的女学生向她走来。这小学生是“劳改犯”徐克文的女儿

小玲。她长得很单薄，两条小腿支撑着她瘦弱的身体，脸上带着和年龄很不相称的病态苍白。不过，脸型却挺秀气，淡如春山的眉毛，微弯着的好看的小嘴唇，只是那眼神象朦胧的山水，锁着云烟锁着雾，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她背着沉重的书包，静静地站在讲台下面，看着李老师擦黑板。

李老师是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身段苗条，面容端庄，修长的双眉，清秀的眼睛，穿一身很得体的素洁衣衫，仪容风雅。从外貌看，她顶多只有30来岁。令人奇怪的是，这位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教师却是没有结过婚的老姑娘。她从来不和人谈论自己的私生活，长年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过着独身生活。她为何不结婚，至今还是个谜。

她擦完黑板，回过头来，发现小玲立在她面前。这是个聪明而可怜的孩子，出生不久，还没有看清楚天地是什么样子，父亲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六岁时，妈妈就狠心地丢下三个儿女改嫁了。从此小玲就孤零零一个人在破房里过日子。这种灾难的生活形成了她郁郁寡欢的孤僻性格。她学习成绩很好，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但是她却象个哑巴，不和人讲话，不见她有过的笑容，下课时间也不和同学玩，常常一个人坐在课室里埋头看书写字。

李文玉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纽带把她和这个女学生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她很爱她，象慈母一样关怀她，在这可怜的孩子身上，她表现出女人天性中的母爱，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总要留一份给她。小玲有时病了，她就把她抱到自己房里，象亲娘一样给她烧汤煎药，三更半夜爬起来给她试温端

水。她一天看不见小玲，心里就象丢失了什么似的。她甚至想把小玲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带在身边一道生活。但这孩子性格太乖张怪僻了，宁愿一个人住在破房子里，也不跟她一道生活。她心里挺爱李老师，但是她在李老师面前也是默然无言，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脸上永远是那副毫无表情的表情。她象一个小小的蜗牛，从小就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严严实实的硬壳里。

李文玉常常痛切地感到：经过了那灾难的漫长岁月以后，不但使一些成年人的思想动脉硬化，连一些孩子也成了思想上的畸形人。

奇怪的是，这时李老师却发现小玲的眼睛里有异样的从没见过的光彩。她惊奇地问：

“小玲，有什么事吗？”

“老师，我下午请假。”小玲轻声说。

“有什么事？可以告诉老师吗？”李文玉温和地问。

“老师，我爸放回来了。”她低着头说。

“啊！”李文玉叫了起来。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李文玉吃了一惊。

“老师，我爸放回来了。”

小玲以为老师没听清楚，又重复了一句。她接着说：

“老师，我爸下午要到家，我请假给他买点吃的。”

“小玲，你爸真的放回来了？”

李文玉惊喜交集。

“真的。老师，真的。老厂长周爷爷昨天晚上来看我，说他今天去接我爸回来。老师，法院说我爸没有罪，不是坏人。”

她望了李老师一眼，又低声说：

“老师，我爸回来，我就不是‘小反革命’了，对吗？”

这话问得稚气，也问得辛酸。

11岁的小孩，还弄不清革命和反革命的含义是什么。她只知道，“反革命”是个极可怕的字眼，连系着无边无际的耻辱和灾难。

在那“血统论”象瘟疫般流行的年月，有些出身高贵、“血统纯粹”的孩子，有时会轻蔑地或者戏谑地叫这个脾气古怪的小女孩“小反革命”，这可怕的字眼象沉重的精神镣铐铐着她许多年。她从娘胎里生下来不很久，“反革命家属”这条“铁锁链”就挂在她的脖子上了。可是，她连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模样儿都不知道哪！

李文玉激动地抱起小玲，使劲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小玲，老师祝贺你，祝贺你爸爸。快感谢党中央给了你爸第二次生命，给你带来幸福！”

李文玉是容易动感情的人，她控制不住，两颗热泪滴落在小玲的脸颊上。

她又深情地抚摸着小玲的鬓角说：

“小玲，你该笑一笑了！”

小玲果然露出一口好看的小牙齿，望着李老师慈爱的脸，动情地微笑了。

“你妈知道你爸回来吗？”李文玉柔声地问。

小玲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象一支刚点燃的蜡烛被风吹熄了似的讷讷地说：

“老师，我不知道……”

李文玉才想起这孩子是从来不在人家面前提起她妈妈的。

小玲的妈妈余丽娜是厂研究所的分析技术员，是厂里第一号的美人儿，有“分析皇后”之称，性情温柔，她爱丈夫，爱儿女，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工作上也很出色，人们都尊重她，喜欢她。可是后来余丽娜不知道为什么发了昏，嫁给了陷害她丈夫入狱的厂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兼所长丘建中，狠心地抛下三个亲生的儿女，和后夫在花园洋房里享福。这一来，她的名声变得很臭，人们一提到余丽娜的名字就要吐口水，骂她下贱无耻、狼心狗肺。

小玲听到别人议论她妈妈，她就象挨了打一样，可怜巴巴地直流眼泪。

李文玉很后悔刚才问这句话。她放下小玲，抱歉地说：

“小玲，原谅我，老师不好。”

“不，老师好！”小玲的眼里突然露出晶莹的泪珠，低着头说，“老师，您比妈好。”

几年来，李文玉第一次听到小玲对她说这样深情的话。她情不自禁地又抱起小玲，说：

“小玲，别哭，你爸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用手绢抹干了小玲的眼泪，自己却流泪了。

李文玉想起了什么，她放下小玲，从讲台下面取出几本书和一包东西，笑道：

“老师给你的，你喜欢吗？差点忘了给你，看我这记性！”

小玲一看，是一本《算得快》和几本《动脑筋爷爷》。她太爱书了，轻声说：

“老师，谢谢您！”

“还有呐！”李文玉打开小包，取出一双挺好看的人造革面小皮鞋，微笑着说：

“你的鞋子破了，把这双鞋换上。”

小玲下意识地望着望脚上那双露出脚趾头的布鞋，低声说：

“老师，我不要。”

“为什么？”李文玉问。

“老师，我有钱，我自己去买。”

“小玲，老师的话你听不听？”

李文玉有点生气了。

“听。”小玲怯生生地说。

“那么，你给我坐下来。”

李文玉让小玲坐在凳子上，把她破了的鞋子脱下来，换上新的，正好！十分合适。

她高兴地抚摸着小玲的肩膀说：

“小玲，回家吧，代老师向你爸问好。”

小玲的单薄身影消失之后，李文玉收拾好教具走出教室。

徐克文回来的消息强烈地震动了她的心。徐克文的三个儿女都是她教过的学生。她和这一家的关系挺不错。徐克文夫妇很尊敬她，经常邀请她去他们家作客。这是多么好的一家啊，谁能想到，竟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伤。这“史无前例”的十年，给人民带来了多少惨重的灾难！

十年前一个可怕的场景又象电光石火般地闪现在脑际……

那是现代迷信到达顶峰的年月，有一天，天气闷热得有点反常，李文玉呆在学校的宿舍里，外面又传来“坚决打倒”之类的呼喊声。那时候，这类喊声太多了。经常有些职工被押解着在厂区和工人新村游街示众。李文玉不愿看这类残酷

的“政治游戏”，她对这些粗野丑恶的声音连听都不要听。

但是，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徐克文”的狂呼声灌入她耳鼓时，她象触了电似的弹跳起来，跑出学校。

一个恐怖的场面出现了：徐克文工程师被五花大绑绑着，头上戴着三尺高的纸糊高帽，胸前挂着大黑牌。他的脸上有一缕干涸的血迹，嘴角上也流着血，目光冷得象两块铁。更可怕的是，在他旁边，余丽娜也被人押着陪斗。她披头散发，怀里抱着未满周岁的小玲，胸前的大黑牌上写着“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家属余丽娜”。她怀里的小孩在哭，她象没有听见哭声似的，眼神呆滞，神情麻木，僵硬地走着。周围是一群手持木棍、气势森严的“群众专政队”的“英雄好汉”们和围观的群众。

一股同情的热泪涌上了李文玉的眼眶。她别过脸去。因为对着“牛鬼蛇神”流泪是会招致可怕灾难的。

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徐克文不知怎么栽倒在地上。

“你装死！”一声粗暴的吼叫，跟着木棍和枪托就落在这受难者的身上。余丽娜象发了疯似地抱着孩子扑到丈夫身上，绝望地哭喊：

“你们打我吧，打死我吧！把我们一块打死吧……”

她怀里的孩子拼命地大哭起来。

李文玉的五脏六腑象搅翻了似的，她几乎喊叫起来，但那时候，公理和正义在哪儿？喊叫又有什么用！

她赶快旋转身急步走回宿舍，眼泪象珠子般滚落下来……

如今，一场可怕而漫长的噩梦终于过去了，天放晴了。受尽苦难辛酸的徐克文终于从囚牢里放回来了。他总算能活

到今天，但是等待他的是破碎的凄凉的家：妻子改嫁了，大女儿成了流氓，儿子远在他乡，只有十一岁的小女儿是迎接他的唯一亲人。而造成这一场惨剧的原因，据说只是因为徐克文失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头像！

这些年来，李文玉一直弄不清楚为什么余丽娜会嫁给丘建中。

徐克文被抓走之后，余丽娜一直茹苦含辛地守着儿女过日子。在她困难的日子里，李文玉给了她同情和帮助。但是几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月黑风冷，外面下着毛毛雨，余丽娜突然冒雨来到李文玉宿舍里。进了门，还没有说话，她的眼泪就纷纷地掉落下来。李文玉扶她坐下，焦急地问：

“丽娜，发生了什么事？”

余丽娜泪流满面地说：

“文玉，我们相识了好些年，我知道你心肠好。你愿意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丽娜，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去做。”

“文玉，我要离开小玲了。小玲还小，你能不能帮我照管这孩子？文玉，把小玲当作你的女儿吧！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给你叩头。”

余丽娜一下子双膝跪倒在李文玉面前，放声哭了起来。

李文玉惊得手忙脚乱地去扶她，叫道：

“丽娜，不要这样，有话慢慢说嘛！你起来嘛！”

余丽娜仍然直挺挺地跪着，声泪俱下：

“文玉，你能答应吗？”

“丽娜，你快起来，我怎么能不答应呢！快起来！要不，我要生气了！”

余丽娜真的要叩头，李文玉气急败坏地把她抱起来，焦急地问：

“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余丽娜坐在李文玉的床沿上，流着泪说：

“文玉，我要嫁人了。”

“啊？”李文玉吓了一跳，“你嫁给谁？”

“丘建中。”

一听这名字，李文玉如五雷轰顶，她一下扑到余丽娜身边：

“丽娜，你不能嫁他，丘建中不是人，是狼！是狗！是畜生！”

“文玉，我没有法子，不论他是什么，我都得嫁给他！”

李文玉火冒三丈地叫道：

“丽娜！你疯了！你难道不知道是丘建中把老徐送进监狱的么！”

“我知道他是魔鬼！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跟魔鬼在一起……”

她哭着说不下去。

李文玉五脏六腑都要炸裂了。她气得全身发抖地喊道：

“丽娜！你要是真的这样不要脸，这样昧着良心去嫁这狗东西，你就别再来见我！”

余丽娜象被人猛抽了一鞭，全身战栗起来，她眼泪朦胧地望着李文玉暴怒的面容，终于低下头，默默地走了出去。

李文玉追到门外时，余丽娜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了。

在那荒唐的年月，生活就是这样不可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象万花筒一样光怪陆离。她熟悉余丽娜的为人，

知道她的善良德性。她觉得：余丽娜宁愿冒着天下人的唾骂去做这寡廉鲜耻的事，肯定是有着巨大的难言的隐痛。李文玉一直是这样看的，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过余丽娜一句坏话。她断定是丘建中逼余丽娜走上这条绝路的。丘建中——这条恶狗，这个披着人皮的豺狼，李文玉一想起这个肮脏的名字就心头作呕……

第二章

小玲的家屋座落在工人新村的一排简陋的平房当中，在周围高大楼房的映衬下，这排平房就象魁梧汉子头上的癞痢疮，颇为难看。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盖宿舍大楼的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工棚，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低矮的墙是用粗黑的煤渣砖垒起来的，屋面是石棉瓦顶，门是破旧的木板拼钉起来的。窗户没有玻璃，用沥青纸钉着挡风挡雨。房子地面很潮湿，夏天热得怕人，冬天冷得刺骨，风沙从缝隙里钻进来。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是“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家属栖身之所。后来落实政策，一些“牛”们搬回到楼房里去了。有些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工人便占有了这些没人要的房子，把农村的家属接来，在这里生男育女。

自从徐克文当了“反革命”，他的一家被赶出楼房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小玲从一岁起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小玲一进家门，四蹄踏雪的花猫就咪呜一声跳到她跟前，翘起尾巴在她的脚边团团转。

在孤寂的生活中，花猫是她唯一的“亲人”。她每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花猫在不在家，要是她看不见它，听不到它亲亲热热的咪呜声，她真不知如何过日子了。

她亲昵地抱着花猫进屋。这房子原来是一个单间，她们搬来之后，用一些破木板在中间隔开，算是一房一厅，房里的光线很暗，白天要开灯才能看书写字。

怀里的花猫用爪子轻轻地搔着小玲的手背，好象用亲昵的动作表达这样的意思：

“小玲姐姐，你回来了。”

“阿妙，爸爸就要回来了，你高兴吗？”

小玲用手梳理着它身上花白而干净的毛，亲切地问。

“咪呜！”花猫回应了一声，好象表示它很高兴。

“我知道你会高兴的。爸爸受了很多苦，你知道吗？”

“咪呜！”这声音表示它知道。

“爸爸回来，你要听话，不要调皮，懂吗？”

“咪呜！”花猫又温柔地回应了一声。

这些年来，她和它之间不但建立了特殊的“友谊”，也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她心里有什么话都对它讲，世界上也只有它对她最亲。她和它之间，没有人世间常见的那种对弱者的歧视，对强者的谄媚，也没有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卑劣关系。她和它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这通灵性的畜生，是决不会出卖“朋友”的。

为了这花猫，小玲几乎和她的姐姐徐惠玲拚过命。

小玲想起了姐姐，就恨得发抖，怕得发抖。她曾经听妈妈说过：姐姐过去是很好的女孩子。文化大革命前，姐姐当过少年先锋队的小队长，会拉小提琴，拉得蛮好，在市少年

官登台独奏招待过外宾，还上过电视。可是她不相信妈妈说的这些，她所知道的姐姐是个很坏的人。姐姐初中毕业后到农村落户，后来逃跑回城，成为流氓，经常蹲监狱，进管教所。常常在外面和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她多次看见姐姐半夜三更摸回家来，脸上挂着血迹，把她吓得要死。可是姐姐却当作家常便饭，不哼也不叫。她对小玲很粗暴，动不动就要骂她打她，但打了她之后又失声痛哭，有时还紧紧地搂着妹妹，发狂地吻她，求她原谅。

有一次，姐姐在外面鬼混了好些时日，鼻青脸肿地回到家，叫妹妹给她弄饭吃。小玲很恨姐姐，姐妹之间早已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是她还是去给姐姐弄饭吃。

姐姐扑在床上闭上眼睛，这时和小玲亲昵惯了的花猫认错了人，悄悄地跳到床上，用爪子轻轻地抓姐姐的脸。姐姐一把抓住花猫的脖子，狠狠地把它攥到床下，又跳下床，使劲地添了一脚。花猫哀鸣着滚到墙角。

姐姐做什么事，小玲都可以不闻不问，唯独这样对待花猫，对待与她相依为命的“朋友”，她是无法忍受的，这是比踢她本人还要严重的事。她扑到墙角边搂抱起花猫，气得全身发抖，指着姐姐喊道：

“你坏！你是坏人！”

她想不出更多的语言来表达对姐姐强烈的憎恨，忽然想起人家背后骂姐姐的话，便冲口而出：

“你是贼，是破鞋！臭婊子！你滚！”

姐姐象发了狂地冲到妹妹面前，一种疯狂的破坏欲使她想搞死花猫。小玲紧紧地抱住花猫，伏在墙角边，嚎啕大哭：

“妈妈！妈妈呀……”

这撕裂人心的哭喊，使姐姐骤然停了手，呆住了。她望着泪流满面的妹妹，脸上一阵痉挛。

小玲突然发现墙角边有一把尖刀，她迅速地拾起来，一手抱着花猫，一手拿着尖刀，靠在墙边，绝望而恐惧地瞧着姐姐，全身在发抖。

突然，姐姐噗的一声，双膝跪倒在妹妹跟前：

“妹妹，原谅我吧！”

泪珠儿纷纷滚下来。又双手掩脸哭道：

“他们为什么要放我出来？为什么不把我枪毙？我为什么要活在人世间？……”

她嚎啕大哭，双手捶着地面。

看着姐姐悲痛欲绝的样子，小玲反而起了怜悯之心，手上的尖刀咣的一声掉在地上。

可是姐姐没有哭多久，眼泪一收，又恢复了冷酷的神情，饭也没吃，就抓起钢链条出去了。

这以后，姐姐再没有回来过。姐姐现在是死是活，小玲也不知道。

她去职工食堂买饭了。小玲放下花猫，叮嘱道：

“阿妙，不要乱跑，我买好饭就回来。”

她拿起饭盆，锁上房门，向食堂走去。

半个钟头之后，她捧着饭回来了，她很高兴，因为买到了一碟鱼，她和花猫都是挺喜欢吃鱼的。

她掏出钥匙正要开门，奇怪，门上的锁被人打开了。她一想，肯定是妈妈来了，她和妈妈都有一把钥匙。

妈妈因为名声很臭，到这儿来，总是象小偷似的悄悄进来，悄悄出去。左邻右舍都讲妈妈坏，特别是隔壁的胡大婶